

中国高层决策 六十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创新

第二卷

范希春 主编

京华出版社

中国高层决策

六十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创新

第二版

陈晋 主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著

范希春 主编

中国高层决策六十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创新

(第2卷)

(1976—1992)

王海洋 范希春 编著

京华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层决策六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创新.第2卷/王海洋,范希春编著.-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24-790-6

I. ①中… II. ①王… ②范…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324 号

中国高层决策六十年

范希春 主编

著 者 王海洋 范希春 编著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43832 84241642(发行部) 64258473(传真)

(010)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字 数 1200 千字

印 张 72.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4-790-6

定 价 150.00 元(全四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一、思想解放运动与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267

- (一)打破“两个凡是”的迷误 /267
-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思想解放运动 /279
- (三)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为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奠定基础 /292

二、科学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305

- (一)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看待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305
- (二)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评价 /320

三、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政治体制改革 /342

-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342
- (二)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353
-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 /368

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376

-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长期坚持不变”——尊重和支持农民的首创精神 /376
-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388
- (三)邓小平关于农村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393

五、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 /403

- (一)对外开放的初步探索 /403
- (二)从特区建设到沿海开放战略到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 /412
- (三)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 /428

六、《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441

(一)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 /441

(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规划 /457

(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463

七、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三步走”战略 /467

(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擘画 /467

(二)由“两步走”目标变为“三步走”战略 /473

(三)“三步走”战略与“五年计划” /476

八、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480

(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任务的提出 /480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491

(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精神文明建设制定跨世纪行动纲领 /497

九、“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形成 /501

(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 /501

(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基本形成 /505

(三)“一国两制”理论的全面阐述 /509

十、党的十三大召开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 /531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萌芽和初步概括 /531

(二)十三大的召开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化 /542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独特贡献 /549

十一、南方谈话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先声 /556

(一)南方谈话产生的历史动因 /556

(二)南方谈话的总体思想 /559

(三)“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 /569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先声 /583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592

第 2 卷
(1976—1992)

一、思想解放运动与 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此时的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选择:一种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彻底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党的工作重点果断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种选择就是继续延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左”的错误思想路线,将中国推向封闭、贫穷和落后。而这一历史抉择的正确与否,首先决定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地对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否能够科学地、完整地理解并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一) 打破“两个凡是”的迷误

1. “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

“两个凡是”思想的提出与华国锋有密切关系。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工作的汇报时,针对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做出明确指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和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起草人员谈话时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1977年2月3日,写作班子负责人、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传达了汪东兴的指示,要求写作班子先发表一篇社论,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内容要写进去,写作班子将华国锋关于“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写进了社论,这就是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表示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文章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出现,按照当时人们的接受习惯,文章所阐述的思想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意志。由此,“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应该说,“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在当时并不是个别人或者说是党中央的某个领导人的思想,而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一股社会思潮。从当时的中央领导层来看,除华国锋外,汪东兴、吴德等,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对此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如汪东兴在1972年就曾说过:“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1976年11月30日,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吴德曾在讲话中讲过:“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而且,《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文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传阅过,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说明,当时党内有一批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尊崇,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是有一定局限的,还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来对待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对“两个凡是”采取了或者是认同的,或者不赞同但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态度。而在理论工作者当中,支持这种观点的也不乏其人。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但是,“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党内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强烈反对。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在讨论这篇文章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但是,由于这篇文章是由李鑫领导的写作班子起草、汪东兴组织审定的,包括当时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谁也无权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而且是以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尽管两报一刊中没有一个人参与文章的起草或者讨论。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研究部署对“四人帮”帮派体系的

揭批查工作。会前,华国锋指示起草报告的负责人,报告的中心要按“两个凡是”的原则来对待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尽管,在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叶剑英曾几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华国锋表面上接受了叶剑英的意见,但在大会上仍然坚持己见。在“两个凡是”思想指导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经过中央反复考虑的,批是必要的。华国锋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次会议从总体上来讲,贯穿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和达到天下大治的八项要求。

3月13日,陈云在会上作书面发言,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

王震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些正确意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被禁止载入会议简报。但迫于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的压力,会议后期,华国锋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在基本思想原则问题上,华国锋的认识并没有根本转变。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的署名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指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一条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文章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说成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思想武器,这说明,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坚持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这一“左”的错误思想路线。

与倡导“两个凡是”相联系的是新的个人崇拜的产生与形成。主持中央工

作伊始,华国锋就允许党内对他本人制造新的崇拜。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会上,耿飚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关于宣传要点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突出宣传华主席;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是彻底揭批“四人帮”。强调把“突出宣传华主席”作为当时宣传要点的要点。1977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恩格斯的《论权威》(节录),并加写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恩格斯批驳了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权威,主张绝对自由的滥调。发表这篇文献,就是为了进一步批判“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2月份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勇敢捍卫者和卓越继承者,无愧为我们党的英明领袖。我们十分感激毛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选定了最好的接班人。文章对华国锋在湖南20多年来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做了回顾,认为华国锋同志一贯忠于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同修正主义和各种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开了对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的先例。3月份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胜利前进》,文章称,毛主席的旗帜,是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的旗帜,始终是我们团结战斗、夺取胜利的根本。英明领袖华主席一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主席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作为我们党的领袖,是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是全党需要他,军队需要他,人民需要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他。有华主席掌舵引路,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无往而不胜。

1977年10月29日,当时的《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文章称:“华国锋同志领导我们党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信赖和衷心爱戴。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领袖”,具有“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进一步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这篇文章甚至说出了这样一段话:“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

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们党的领袖,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可靠保证。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同他斗争到底。”文章最后引用了列宁的话“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①

1977年11月28日,当时的《北京日报》发表长篇纪实文章《颂歌献给华主席——首都八百万人民欢呼我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全文充满了“个人崇拜”的气息,文章写道:

华主席登上天安门,革命人民齐欢腾;英明领袖来掌舵,祖国前程似锦。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的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首都广大军民手持华主席像,回顾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战胜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怎么能不向自己信得过的领袖纵情欢呼,怎么能不向自己靠得住的统帅放声歌唱。

华主席掌舵挥巨手,扫除“四害”功不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胜利凯歌传全球。

华主席啊,华主席!是您率领我们除妖魔,除四害,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

是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处理了国内、国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您是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和统帅!有您掌舵,我们子子孙孙都放心!有您引路,我们世代都紧跟。

红心向着华主席,革命到底志不移。

在当时,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急剧升温,诸如“英明领袖”、“统帅”、“舵

^①《解放军报》,1976年10月29日。

手”、“指路灯”、“灯塔”等等溢美之词,都加到了华国锋的身上。华国锋本人的巨幅画像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一起在公开场合摆放和悬挂,甚至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厅堂。曾经有个省份,还举行了迎请华主席像的仪式:华主席的画像用飞机运到机场,省委领导双手抱着空镜框率队到机场迎接,将画像装进镜框里回到省委后,各单位再敲锣打鼓到省委迎请华主席的画像,这样一来,满街都是迎请华主席画像的队伍。一时之间,热爱华主席、忠于华主席、紧跟华主席、拥护华主席、保卫华主席的标语和口号充斥各种公共集会场合,到1977年末,基本上形成了新一轮的个人崇拜高潮。

这一新的个人崇拜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早在1976年,毛泽东主席在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就作了这样的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根据这一指示,报刊上发表了許多介绍、宣传华国锋的文章。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领导人来填补这一心理空白,这种精神需要使得人民把华国锋这位毛泽东主席选定的接班人、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当成了主心骨,人们模仿对毛泽东主席的称谓、做法来对待华国锋是一种历史惯性和思维惯性。客观地讲,当时新的个人崇拜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完全避免形成新的个人崇拜,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为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为开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和一定的基础;但是,华国锋等人始终无法摆脱掉特定条件下的历史局限性,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允许和支持新的个人崇拜;对于刚刚粉碎“四人帮”,亟需破除迷信,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中国,进行新的历史大转折,起到了一定的客观上的阻碍作用。

2.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

对于“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党内外的任何领导职务,但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进退出处和政治得失而放弃自己的根本原则。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华国锋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

兴、副主任李鑫到邓小平住处,找邓小平谈话,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明确提出,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前要写个文件,要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当即拒绝,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还明确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并要求中央把这封信转发全党。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使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初步的正确认识。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思想观点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

1977年5月24日,王震、邓力群前往邓家探望邓小平,在同他们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他说: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的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①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

①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第38—39页。

②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版,第39页。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了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议程;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为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准备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这次会议,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实现拨乱反正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党的中央主席华国锋仍继续坚持和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会议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认为,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以及为实现这一“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针对这一情况,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作了讲话。首先,邓小平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讲道: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